

难忘手写稿年代的往事

□ 信宝忠

1967年12月,我参加铁路工作的第三年,就参加了古冶铁路地区党委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成为一名党报业余通讯员。至今已经50余年。

这些年,从参加工作初始用粉笔写黑板报、用钢笔写稿件、用信封投递稿件,到用传真机发稿件、用邮箱发稿件、用微信传稿件,一件件往事难以忘怀。

手写时光最难忘。用笔在纸上写文章,可以一气呵成,用不着一边敲打键盘一边看打出的字,而且写出来以后可以用传真机随时传过去,省事、省时又省力。一旦稿件见了报,自己还可以与底稿对照一下。几十年前写过的一些原稿我还珍藏着,真是其乐无穷!

在手写年代,我随身带着稿纸、信封和笔,看见或听见时效性强的新闻报道线索,拿出笔就写,写完马上往报社、电台送,基本做到上午发现的新闻晚上送稿,下午发现的新闻晚上送稿,不隔天,就连星期天、雨雪天也不例外。报社、电台传达室的门卫都把我当成老熟人了。

打字发稿最快乐。20世纪90年代以后,用笔写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给报社投稿大多改用邮箱发送,这下子难住了我。我不会拼音打字,也不会用电脑,尽管女儿给我买了电子书,为我配全了电脑、打印机,在键盘上贴了对应汉字,还给我配置了一个汉王笔,我使了半天劲还是没有学会。起初我先用笔在稿纸上写好文字,让女儿或女婿帮我打字,用邮箱发给我,我改好后再发过去,有时赶上急稿我还一个劲地催。女儿气得对我说:“总让人帮,看你以后还怎么写写文章!”这句话真是提醒了我。不会使电脑,等于睁眼瞎、干着急。在老伴的鼓励下,我首先从学拼音开始学打字,就像小学生一样一天学几个记住几个,接着在键盘上一点点熟悉拼音练打字。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的勤学苦练,我逐步可以在电脑上打字写文章了!尽管速度慢一点,笨鸟先飞也挺满足。2011年7月,我即将退休,一家地方铁路公司找我返聘负责搞宣传,第一句话就问我会不会打字。这样,我又先后在这家铁路公司搞了4年宣传工作。

在退休的这14年中,我逐渐习惯了用电脑打字,与笔和稿纸渐行渐远,于是把以前用的稿纸都闲放在书柜里,成为我永远的记忆。我在电脑上打字,先后筛选整理了参加工作以来在中央、省、市和铁路各新闻媒体刊登的近万篇各类新闻稿件,先后编成了四部作品集,累计100多万字。

回顾手写作的那些年代,酸甜苦辣余味悠悠,如今最让我欣慰的是,多年勤于钻研业务的习惯使我在古稀之年跟上了飞速发展的时代步伐,电脑、手机、电子邮箱、微信……我的写作生涯也做到了与时俱进,没有被时光淘汰。

资讯

我市两位作家作品获团结出版社优秀图书奖

4月28日,团结出版社在承德召开优秀图书奖座谈会。我市作家杨立元创作的文学评论专著《承德作家论》和刘长明创作的长篇小说《新生》,被该社评为2021—2023年度优秀图书。团结出版社向优秀图书奖获奖者颁发了证书。

《承德作家论》是杨立元教授“滦河作家系列评论”专著(共10部)的最后一部。此书的出版,使他完成了“为滦河作家作论,为滦河文学写史”的夙愿。该书运用诗学和史学、美学和社会学、个人和时代、作家群落和地缘文化的综合视野,对承德作家群进行了深度观照和全面评论,受到读者尤其是承德作家的好评。

《新生》是刘长明献给唐山大地震45周年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平视角、小人物,讲述了震后唐山人心灵修复的故事。心灵修复的艰难与痛苦,使劫难之后的唐山人有了更加强大的心力,对生活与生命有了更加崇高的认识。该书曾在《唐山晚报》《唐山文学》连载,在喜马拉雅网络平台播出。(烁辉)

李大钊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始末

□ 刘凤敏



(三)李大钊在莫斯科

由满洲里出境后,李大钊一行到了苏联86号小站(今俄罗斯后贝加尔斯克),被安排在铁路车站站长家,受到了站长夫妇的热情款待。后又由西伯利亚铁路经赤塔等地去莫斯科。李大钊住在卢克斯大旅馆的三楼,每天文书繁忙,应接不暇。

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这是共产国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以后(1925年1月)中共四大的召开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510名,代表49个国家的60个组织。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影响还没有受到共产国际的足够重视,会议虽然成立了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妇女委员会、青年委员会等若干专门委员会,但李大钊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并没能参加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等重要的委员会,

只有王荷波参加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刘清扬参加了妇女委员会。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报告,批评了欧洲各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上的错误,也回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在如何对待国民党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他说,国民党正向右转,并对帝国主义进行着真正的革命斗争。6月30日,共产国际主持民族殖民地工作的曼努斯基作报告,他在国际问题上继续强调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政策,又一次批评中共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同共产国际存在分歧。

1924年7月1日,共产国际五大第21、22次会议上讨论了曼努斯基的报告。在第22次会议上,李大钊(化名琴华)作了书面发言。7月11日,李大钊的发言以《中国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发表于《真理报》上。李大钊没有直接回答曼努斯基的批评,而

是介绍了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嚣张活动的九个事件,即张家口的事件、汉口纺织工人事件、法国金法郎事件、旅顺口和大连、临城事件、棉花出口、烟草消费税、广州的关税、列强的海上联合舰队,认为“这一切都证明,帝国主义始终力图利用微不足道的小事为借口来扩大其势力及特权”。李大钊还重点阐述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的目的、作用和意义,希望共产国际五大应该特别关注中国问题,给予中国共产党工作指示。李大钊直言,“我们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引导他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军阀。在国民党内,我们将其左派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并以此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尽管工人运动的发展由于反动势力而受到极大阻碍,北方的工人组织仍在我们掌握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有一定的影响,而

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相继回国,李大钊继续留在苏联,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其间,李大钊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处参观访问,并应多方邀请作报告、发表谈话和讲演,撰写有关访苏通讯或有关中国革命的政论文章等,积极宣传、介绍中国革命,争取苏联及各友好国家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在近半年时间里,李大钊留下了《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上海的童工问题》《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等15篇重要文献。同时,李大钊坚持出席中共旅莫(斯科)支部的工作会议及相关活动,参与指导日常工作,并曾在中共旅莫支部的全体大会上,作了《中国最近之政变》《中国的事变和本团的训练》等关于国内革命形势的报告,进一步坚定了革

命信念和革命意志,对中国革命充满豪情壮志和殷切期望。

1924年9月22日,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李大钊在“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大会上发表演讲,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当时正在经受的苦难和压迫,讲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成长,呼吁各友好国家帮助中国革命:“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问题,而是一个国际问题。没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援助,中国的民族运动就不能发展。只有无产阶级能起到的革命领导者的作用。”演说结束时,李大钊振臂高呼“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万岁”“反对武装干涉中国”等口号,赢得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次演讲是李大钊第一次在共产国际的演讲,也是最后一次,留下的十几秒视频是李大钊唯一一段活动影像,直到1999年才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找到,让我们看到了当年李大钊的昂扬神态和风采。

领异标新创“祥隶”

□ 刘士裕

书法创新难,隶书创新尤其难。

为什么?因为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的一次大改革,自秦汉至清代的两千年间,在隶书诞生、发展、传承、演化过程中,无数前贤穷研细究,以惊世的变革创新,将隶书一次次推向新的境界,体态趋于规范,风格几近完美,再变化的空间有限,调整更新的余地也相对很小。因此实现隶书新的突破谈何容易。

然而,就是在这“难上加难”的领域,王祥之先生却在“中国书坛悄悄地发起一场‘隶变’”。他积年累月勤耕,穿百砚,秃千笔,锲而不舍,终以“祥隶”的创立,铸就了这一古老书体新的辉煌。

我和王祥之先生多有交往,但2001年始未能见他的音讯,打电话也联系不上。我知道他平时很忙,后来就不再打扰。直到

2002年春节,王先生约我到他家叙谈,才知晓其中的原委。

原来一年前,北方方正电子有限公司决定将王祥之先生的隶书定名为“祥隶”,开发并输入电脑字库。其软盘定于2002年5月初在国内外发行,需要他书写近万个“祥隶”规范字,且繁体、简体各一套,只给10个月。因时间紧迫,他只能深居简出。

在王先生工作室交谈中我得知,北方方正是国内出版电脑书法软件的权威性机构。当时只有舒同、启功等少数著名书法家获字体命名之殊荣。我问及“祥隶”出版发行的背景,谦和儒雅、性格爽朗的王先生莞尔一笑说:“‘祥隶’是北方方正从全国范围的隶书中筛选出来的。他们开发字体极严格,要求风格独特、个性鲜明、字体规范、影响广泛,且具有独创性。至于为什

么把我的隶书定名为‘祥隶’,我猜想有两个因素:一是选用我名字中的‘祥’字,体现了书法创作的主体;二是‘祥隶’寓意祥和、吉祥,在社会上容易被接受。”他对自己多年的心血羽化为一种新的书体,感到十分欣慰。

其实,“祥隶”从初始到自成一格,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在长期书法实践中,王先生深谙线条和结体是构成书法形式美的最基本要素,因而他惨淡经营,终其半生精力,方寻到创新的独特路径。

王先生在椅子上欠了一下身,摘下眼镜,深深地呷一口茶水。他说:“我性情所好是雄强苍劲、浑朴厚重一石,在遍临《祀三公山碑》《石门颂》《张迁碑》和银雀山、马王堆、武威汉简帛书的基础上,选取了《好大王碑》作为基本字帖,毫不犹豫

地舍弃了通常‘蚕头雁尾、一波三折’的标准模式,取其顿挫的直线,凸显线条的苍劲感。在结体上,我舍弃了汉隶内紧外松的惯例,取向于外紧内松,呈现出中宫宽博、四周收敛的态势,示人以雄强、厚重、力量的阳刚之美。同时将撇捺缩短为两个点,以突出其胸襟的博大,使字的重心下移,增强了稳定感。为此,有些朋友称我的隶书为‘短腿隶书’,这虽然抓住了它的外在特征,也很形象,但过于民俗化,我觉得还是叫‘祥隶’好。”

当“祥隶”以突破古人又别于今人的独特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时,还有谁怀疑它在当代书坛上的独特地位呢?我向王先生请教成功的秘诀,他说:“兴趣和爱好是我学书的无穷动力和源泉”,随后向我讲述了自己学书的历程。

他1941年出生于文化之乡乐亭,从小就喜欢写字、画画。在乐亭一中,教美术的易惠堂老师乐于给他和几个同好的伙伴“吃偏饭”,无疑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艺术的种子。不久,在“选飞”中,他脱下学生装,换上了军制服,但对画画兴趣仍然不减。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在艺术的旅途上没有平坦大路可走。王先生和许多书家一样,既要做好本职工作,又要追求艺术。很长时间,他只能挤做饭的时间练习书法。烧饭时,有三五分钟空闲,便跑到房间里写上几笔。稍一入神,多写上几个字,那边厨房便告急,不是饭做糊了,就是奶烧“跑”了,有时铝质锅底被烧化。为了两者兼顾,后来他干脆把书桌搬到厨房,一边是笔墨纸砚,一边是油盐酱醋。有感于饭菜味和着翰墨香,他索性把书斋名改为“五味斋”,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知道。

王祥之先生成功了。当今



“祥隶”已被众多街面牌匾、报刊题头、碑额碑文使用,走进千家万户。在人们对王先生表示由衷敬佩和感激时,他没有固步自封、沾沾自喜,而是跨上了继续探索的新征途。

他深知大家是隶书的母体,于是溯本求源,又一头扎进琳琅满目的金文、古籀书法世界。他钟情于商周时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对《虢季子白盘铭》《毛公鼎铭》《散氏盘铭》《大孟鼎铭》逐字推敲品味,着力临摹,体会其铸凿书法,奇异形体,巧妙变化,无穷趣味。经长期浸淫,其大家书法日臻成熟,形成个性风貌,2007年终于《王祥之大家对联100例》一书的问世而一飞冲天。

他凭借对各种书体探源索隐的深厚功底,历时十载,向国人奉献出《图解汉字起源》一书。这部专著将甲骨文、金文与社会和自然界的物形相对照,按物类把汉字分成26篇203部,详细解读了一千多古文字的造字与演变过程,以及造字五法、汉字中的形符、声符等问题,为探索文字起源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范式,图文并茂,趣味幽眇,蔚为壮观。王先生以一己之力完成如此浩繁的巨制,难能可贵。

本文写到最后,我不愿以“大师”“名宿”等称谓来评价王祥之先生,估计他也不欢迎这样做,应该说他对艺术是执着且忠诚的,他的那支笔属于人民。我为这位乡兄骄傲。

(本文标题字体即为王祥之先生创立的祥隶体)

